

# 當代卡塔盧尼亞女性偵探小說中的 性別、身分認同與暴力： 以奧莉薇、西摩及瑪荷納的作品為例<sup>\*</sup>

楊瓊瑩

## 摘 要

奧莉薇 (Maria-Antònia Oliver)、西摩 (Isabel-Clara Simó) 及瑪荷納 (Assumpta Margenat) 屬於新生代的女作家，先後於 1980 年代後期開始活躍於西班牙文壇，她們三人均來自卡塔盧尼亞語區 (卡塔盧尼亞、瓦倫西亞、巴莉阿里群島)，皆以卡塔盧尼亞方言書寫其女性偵探小說。儘管三位女作家的寫作風格不同，詮釋女性主角與犯罪世界之關係也極不相同，但由於她們均選擇卡塔盧尼亞方言來創作，突顯了方言文學尤其是卡塔盧尼亞文化的再興與擴張。

奧莉薇的《紫色的研究》(*Estudi en lila*) (1985)、《對蹠地》(*Antípodes*) (1988) 是一系列以巴塞隆納地區的女性私家偵探羅妮亞 (Lònia Guiu) 為主角之偵探小說。作品中，羅妮亞具有強烈的社會意識，非常執著於辦案，強調性解放、兩性平等，時時挑戰男性公共領域，是西班牙的女硬漢及自由女性主義派的代言人。西摩的《黑色的影子彷彿暴風雨之烏雲》(*Una ombra fosca, como un núvol de tempesta*) (1991) 則描寫一位原先是平凡的家庭主婦莎拉 (Sara) 後因丈夫慘遭謀殺而搖身變成女性偵探的辦案故事。在漫長的辦案過程裡，女主角除了揭發丈夫生前不可告人的非法交易，也經歷了女性自我追尋與主體認同的旅程。瑪荷納的《遠離安道爾》(*Escap't d'Andorra*) (1989) 卻是一部以女性犯罪復仇者羅西 (Rossi) 為主的傳奇偵探小說。藉著羅西反傳統的復仇者角色，作者強烈的批判以男性為中心的資本主義所衍生的性剝削與性暴力。

本論文旨在探討奧莉薇、西摩及瑪荷納三位女作家如何運用偵探小說文類 (detective genre) 呈現性別、身分認同與

---

<sup>\*</sup>本論文乃筆者 97 年度國科會研究計畫 (NSC 97-2410-H-004-158) 的部分成果。筆者特別感謝《文山評論：文學與文化》期刊兩位匿名審查者對修訂本稿所提出的建議。

\* 本文 99 年 3 月 28 日收件；99 年 7 月 2 日審查通過。

楊瓊瑩，國立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程專任西班牙語副教授。

E-mail: cyyang@nccu.edu.tw

暴力的主題，藉以解構傳統父權社會所賦予女性之刻板形象，並再現女性／他者的特質，試圖突破卡塔盧尼亞女性的雙重邊緣化之困境。

**關鍵詞：**女性偵探小說、性別、身分認同、暴力、雙重邊緣化

# Gender, Identity and Violence in Contemporary Catalan Detective Fiction by Women: The Case of Maria-Antònia Oliver, Isabel-Clara Simó and Assumpta Margenat

*Chung-Ying Yang\**

## ABSTRACT

Maria-Antònia Oliver, Isabel-Clara Simó and Assumpta Margenat belong to the new generation of female writers and began to emerge in the 1980s from the Catalan-speaking regions of Spain, namely Catalonia, Valencia, and the Balearic Islands. Though each writer posits a diff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her female characters and the world of crime with a variety of literary styles, all these three authors have chosen to write their work in Catalan or one of its dialectical variants to stand out regional literature, in particular the revival and expansion of Catalan culture.

Oliver's works *Estudi en lila* (*Study in Lila*, 1985) and *Antípodes* (*Antipodes*, 1988) feature Lònia Guiu, a Barcelona-based, professional female private eye. Through Lònia's investigations Oliver provides u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examine in depth a number of issues which have a particular relevance for women. Simó's *Una ombra fosca, como un núvol de tempesta* (*A Corpse of One's Own*, 1991) centers on Sara, a middle-aged housewife turns detective when her husband is murdered. During the lengthy investigations, Sara not only uncovers the truth about her husband's shady business, but also has gone through her journey of self realization. Margenat's *Escap't d'Andorra* (*Wild Card*, 1989) features Rossi, a female criminal avenger. Through Rossi's anti-traditional female role, the novel intends to criticize sexual exploitation and violence

---

\* Chung-Ying Ya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panish, European Studies Progra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E-mail: cyyang@nccu.edu.tw

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male-controlled capitalism.

The present essay aims to study how these three female authors use the detective genre to explore themes of gender, identity and violence with the purpose of deconstructing the rigid women's roles and stereotypes by conventional patriarchal society, and to represent women's/Other's traits so as to rewrite the double marginalization of Catalan women.

**KEY WORDS:** women's detective fiction, gender, identity, violence, double marginalization

## 一、前言

長久以來，由於西班牙文學評論家的性別偏見及男性優越感，致使女性作家的作品通常不被選錄於西班牙文學史集中，其作品可說是「被邊緣化、被平凡化、或是被忽視了」(Davies, 1998:3)。就偵探小說文類 (detective genre) 而言，西班牙女性作家更是極少被提及，即使她們在該文類發展之初便投入創作。最明顯的例子是巴尚 (Emilia Pardo Bazán)，早在 1911 年她便出版了中篇偵探小說〈血滴〉(La gota de sangre)，對於西班牙早期偵探小說的發展扮演著先驅者的角色；另外，五十年代頗受大眾歡迎的暢銷女作家卡爾 (Isabel Calvo de Aguilar)，經常將英式古典偵探小說的模式運用於作品中，可說是西班牙的克麗絲汀 (Agatha Christie)，然而她的小說也從未出現在偵探文學評論中。美國知名女性主義學者克萊 (Kathleen Gregory Klein) 在其專書《女性偵探：性別與文類》(The Woman Detective: Gender and Genre) 中則批評「長期以來，偵探小說文類的創作一直存在性別偏見，導致傳統上女性地位被邊緣化，使女作家在此文類中難以突顯出來」(Klein, 1995: 2)，因此，她認為必須創作以女性為中心 (feminocentric text) 之偵探文本以拓展更廣闊的偵探小說之視野。英國學者克蘭妮·法蘭西斯 (Anne Cranny-Francis) 也指出，許多女性主義作家運用偵探小說文類的特質來檢視或顛覆男性偵探的傳統角色，進而建構其作品的女性主義意涵，由此，時而挑戰、質疑資產階級父權體制裡個人主體的認同議題 (1990: 144)。對於女性作家與女性讀者而言，偵探小說，尤其是美式硬漢偵探小說 (American tough/hard boiled school)，經常反應當代社會與文化的種種變遷，比起其他文學形式或許更貼切的呈現與女性相關的嚴肅議題，例如：性別壓迫、性騷擾、性暴力、性別關係、自我追尋與實踐等。偵探小說提供了理想的文學模式與寬廣的書寫空間，讓女性作家盡情的抒發其女性主義之論述，進而藉著女性主角偵辦犯罪案件的過程探討女性權力與女性意識的覺醒。

然而女性作家若覺得受到西班牙文評家之隔離與邊緣化，那些母語非卡斯提亞語 (Castilian) 的女性則屬於西班牙的「雙重少數民族」(double minorities)。事實上，直到近年來，以西班牙所謂的其他語言，例如：卡塔盧尼亞語 (Catalan)、巴斯克語 (Basque) 及加利西亞語 (Galician) 所書寫之文學作品，才逐漸受到文壇的重視。昔日在佛朗哥的獨裁統治下，

這三種語言被執政黨視為一種無法接納的邊緣國家主義之語言，對於當時西班牙中央集權與統一的理念目標造成極大的威脅，因此遭到官方強烈禁用。直到八十年代，隨著佛朗哥獨裁時代的結束，西班牙政治與社會產生風起雲湧的劇變，隨之掀起出版少數語言的作品風潮，其推動力主要來自於一些自治區政府極力提供經費補助以展現他們獨具的國家認同特質。另外，由於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帶動了兩性平權等議題，西班牙文壇也興起女性作家的創作風氣，社會大眾爭相閱讀女性作家的作品，間接造就了不少女性暢銷作家，其中也包括以其他語言寫作的女性偵探小說家。

奧莉薇（Maria-Antònia Oliver）、西摩（Isabel-Clara Simó）及瑪荷納（Assumpta Margenat）屬於新生代的女作家，先後於八十年代後期開始活躍於西班牙文壇，她們三人均來自卡塔盧尼亞語區（卡塔盧尼亞、瓦倫西亞、巴莉阿里群島），皆以卡塔盧尼亞方言書寫其女性偵探小說。儘管三位女作家的寫作風格不同，詮釋女性主角與犯罪世界之關係也極不相同，但由於她們均選擇卡塔盧尼亞方言來創作，突顯了方言文學尤其是卡塔盧尼亞文化的再興與擴張。

奧莉薇的《紫色的研究》（*Estudi en lila*）（1985）及《對蹠地》（*Antípodes*）<sup>1</sup>（1988）是一系列以巴塞隆納地區的女性私家偵探羅妮亞（Lònia Guiu）為主角之偵探小說。作品中顯現羅妮亞具有強烈的社會意識，對於辦案非常執著，強調性解放、性別平等，時時挑戰男性公共領域，是西班牙的女硬漢及自由女性主義派的代言者。西摩的《黑色的影子彷彿暴風雨之烏雲》（*Una ombra fosca, como un núvol de tempesta*）<sup>2</sup>（1991）則描寫一位平凡的家庭主婦莎拉（Sara）因丈夫慘遭謀殺而搖身變成女性偵探的辦案故事。在漫長的辦案過程裡，女主角除了揭發丈夫生前不可告人的非法交易外，也經歷了女性自我追尋與主體認同的旅程。瑪荷納的《遠離安道爾》（*Escap't d'Andorra*）<sup>3</sup>（1989）卻是一部以女性犯罪復仇者羅西（Rossi）為主的傳奇偵探小說，藉著羅西反傳統的復仇者角色，作者強烈的批判以男性為中心（phallogentric）的資本主義所衍生

<sup>1</sup> 本論文有關奧莉薇（Maria-Antònia Oliver）的兩部小說《紫色的研究》（*Estudi en lila*）與《對蹠地》（*Antípodes*）之部分引用取自於卡塔盧尼亞語原文。

<sup>2</sup> 本論文關於西摩的小說《黑色的影子彷彿暴風雨之烏雲》（*Una ombra fosca, como un núvol de tempesta*）之部分引用取自於哈爾德（Patricia Hart）的英文譯本。哈爾德的英文譯本書名為 *A Corpse of One's Own*，但筆者認為卡塔盧尼亞語原文書名之直譯較接近作者的創作動機。

<sup>3</sup> 本論文有關瑪荷納的作品《遠離安道爾》（*Escap't d'Andorra*）之部分引用取自於瑪克托斯（Shelia McIntosh）的英文譯本。該譯者的英文譯本書名為 *Wild Card*，取自於女主角羅西閒暇無聊時獨自玩的西班牙紙牌遊戲，筆者仍沿用卡塔盧尼亞語原文書名之直譯。

的性剝削與性暴力。

本論文旨在探討奧莉薇、西摩及瑪荷納三位女作家如何運用偵探小說文類呈現性別、身分認同與暴力的主題，藉以解構傳統父權社會所賦予女性之刻板形象，並再現女性／他者（Other）的特質，試圖突破卡塔盧尼亞女性的雙重邊緣化之困境。

## 二、卡塔盧尼亞女性偵探小說的崛起

根據學者哈爾德（Patricia Hart）及雷希納（Joan Ramón Resina）的研究，卡塔盧尼亞是西班牙第一個犯罪／偵探小說文類蓬勃發展的地區（Hart 1987: 51; Resina 1994: 119），主要是因為資本主義工業化早在十九世紀便在該都會地區誕生，而此點被視為偵探文學興起的重要元素。卡塔盧尼亞除了其地理位置較瀕臨北歐地區－犯罪／偵探文學的早期發源地，宮爾西（Daniele Conversi）也提出該地區有教養的資產階級長期以來不斷接受與吸取外來的文化影響與模式，均造就犯罪／偵探小說的發展（1997: 188）。

犯罪／偵探文類在卡塔盧尼亞具有相當漫長、輝煌的歷史，但在佛朗哥極權統治時期，方言寫作受到執政黨打壓，某些小說家仍堅持以卡塔盧尼亞方言來書寫作品，此足以證明其保存、推廣該語言的用心。當時，以非卡斯提亞語出版並不被執政黨認可，即使於佛朗哥死後的轉型期（Transition period），卡塔盧尼亞仍必須克服早先佛朗哥政府的強制政策與多年來卡斯提亞語區鼓勵大量勞工人口遷徙至巴塞隆納所帶來的文化阻礙。基本上，卡塔盧尼亞的傳統文學模式偏向於學院派。許多卡塔盧尼亞作家於二十世紀中葉面臨語言整合的困境時，開始認真思索能突破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風格及卡斯提亞語帶來的語言糾葛之文學形式。偵探小說文類對於卡塔盧尼亞作家而言，則是一項能推廣其作品與鼓勵書寫卡塔盧尼亞方言極為重要的媒介。知名偵探小說家例如：瓦思奎斯·孟德曼（Manuel Vázquez Montalbán）及福斯德（Jaume Fuster）也一致認為大眾文學諸如犯罪／偵探文類有助於建構卡塔盧尼亞之國族認同，而大眾文化對於卡塔盧尼亞的語言及移民文化之整合扮演重要的角色。一般而言，偵探小說旨在探索「誰」是犯罪兇手，作品敘述主題不僅環繞在揭發罪犯的身分，也試圖辨別其犯罪的動機，因而身分認同的主題儼然成為偵探文類不可或缺的元素。芒特（Sally Munt）指出，犯罪／偵探小說裡的「神秘推動力」（driving mystery）便是「身分認同的追尋—

不僅是謀殺兇手的身分，更擴及到讀者的身份認同」(1994: 207)。筆者認為犯罪／偵探小說裡身分認同之主題在多語種、多元文化的社會，尤其以卡塔盧尼亞地區為例，更能幫助讀者了解卡塔盧尼亞的國家與文化認同政治的特質。

在卡塔盧尼亞，率先進入偵探小說創作領域的作家便是女性作家。在其將近七十年的創作歷史裡，不乏有知名的女性作家曾發表偵探小說或與其文類結構相仿的作品，例如：羅多雷達（Mercè Rodoreda）—二十世紀卡塔盧尼亞最傑出的女性小說家，也曾於三十年代末期書寫短篇偵探小說〈罪惡〉（*Crim*, 1936），旨在反諷英式推理小說的神祕特質；另一位女性主義作家卡普曼尼（Maria Aurèlia Capmany）也於六十年代出版一系列的偵探作品，利用此文類間接批判當時的社會、政治局勢。根據卡茲蘭（Shelley Godsland）的研究，由卡斯提亞語系的女性作家所書寫的偵探文本較傾向於探討性別與犯罪之間的關聯，多以女性主義者或女性為中心的觀點出發；然而由卡塔盧尼亞女性作家所創作的作品，除了探討性別的議題，也包括對於國族認同的關懷（2007: 144）。許多文評家指出，卡塔盧尼亞女性由於其性別及國族之關係，最終仍被歸類於西班牙的「雙重少數民族」，作家們不時在文中透露國家「中心」（西班牙）與視為邊緣的「國家中的國家」（卡塔盧尼亞）之二元對立關係；女性偵探小說的女性人物則被賦予象徵的意涵，不斷突破性別、身分認同及父權暴力所帶來的障礙，好比卡塔盧尼亞多年來極力爭取自治權一樣。

### 三、解構性別與追尋多重身分認同

前面已提到，身分認同始終是偵探小說的重要主題之一。芒特在其英美女性偵探小說的分析裡，不斷強調身分認同之追尋對於當代女性偵探小說具有特別的涵義，因為許多女性作家藉著書寫該文類來探索女性身分認同的論述，也正好應證在奧莉薇、西摩及瑪荷納的創作理念中。我們發現三位女作家巧妙的以偵探文類為媒介，創造了女性偵探角色（不管是專業的私家偵探羅妮亞亦或是家庭主婦莎拉），藉以挑戰長久以來身分認同被定位在單一、固定的理念，而她們特別針對父權體制下所制定的女性特質，試圖呈現身分認同的過程是具有動力且富含多重選擇性，因女性角色可以是主動、有認知理念的個別主體。武拉德（Kathryn Woolard）在其專書《雙重言語》（*Double Talk*）中探討卡塔盧尼亞的雙語文化（卡斯提亞語及卡塔盧尼亞語）及族群的發展情形，也提到卡塔盧



尼亞居民由於長期受到複雜的社會語言文化相互交流之影響，「自然而然的必須同時面對兩個層面來檢視他們的身分」(1989: 58-59)。武拉德的研究強調雙語的環境造成雙重身分認同，認同的歷程是充滿變動性、流動性，也暗指一連串的選擇與自我意識的建構。無疑的，奧莉薇、西摩及瑪荷納的偵探小說中的女性角色均具雙重／多重身分，充分解構傳統負面及刻板的女性特質。

羅妮亞是奧莉薇的一系列美式硬漢偵探小說的主角，其身分為女性私家偵探，也是作品的第一人稱敘述者。她是一位來自馬尤爾卡島（Mallorca）的中年女性，後來移居至巴塞隆納工作，爾後在當地開設私家偵探社，她所從事的行業對於西班牙女性而言，是不被傳統父權社會所認同的。實際上，羅妮亞不僅是具有自由行動及經濟自主能力的女性偵探，也能夠充分行使自我決定權，尤其對男性屬下展現其掌控力，這些都顛覆了女性在傳統男性偵探小說所扮演的柔弱女子或惡女角色。羅妮亞以第一人稱敘述者發聲，根據卡茲蘭的論點，女主角試圖行使權利不僅為了自我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也為了突顯女性偵探文本的價值(2002: 349)。在許多場合中，羅妮亞不斷挑戰男性公共領域，儼然是西班牙的女硬漢，以女性的角度來調查那些對女性造成傷害、威脅的犯罪案件，因她認清女性不只是慘遭惡徒摧殘的受害者，更是長年飽受父權暴力體制侵害的犧牲者。女主角除了挑戰傳統女性的職業，也重新為自己命名（她原名是阿波羅娜—Apollonia）以去除阿波羅（Apollo）的痕跡，一個在女人心目中代表父權的象徵。由此，我們不難看出作者試圖消除凌駕於女性的父權。

相對於羅妮亞近乎女英雄的行動力，西摩及瑪荷納的偵探文本中的女性人物則呈現非行動力的女性也能有所作為，正好重新修正修姆（Maggie Humm）指出偵探文類通常強調男性角色的主動、行動力，而女性角色卻侷限在被動、非行動力的框架之論點（1990: 238）。取而代之的，則是女性的耐心、仔細、冷靜、低調，終能達成個人的目標，對讀者而言，也是頗具諷刺意涵的角色楷模。瑪荷納的《遠離安道爾》，嚴格來說，是一部非行動的驚悚小說（thriller）（廣義而言，仍屬於偵探/犯罪文類的範疇）。羅西在小說裡是一位有勇氣與毅力的戲劇性人物，在某一年的冬季，為了解決自身的經濟危機，她決定越過卡塔盧尼亞的邊界到安道爾<sup>4</sup>的大型超級市場擔任櫃檯收銀員一職。雖然安道爾與卡塔盧尼亞

<sup>4</sup> 安道爾共和國位於法國與西班牙交界的庇里牛斯山中，為歐洲頗負盛名的滑雪勝地及法國、西班牙的免稅天堂。

的社會文化相近，但羅西仍然感受到強烈的種族、性別歧視。當她發現自己與眾多女性員工為了求生計，必須屈服於男性主管的性騷擾時，便暗自籌畫「復仇」的謀略—竊取超市經理寇爾（Coll）不法的金錢，順便替經濟不平等的女性爭取「正義」。此時的羅西儼然扮演復仇者、犯罪者的角色。故事最後是由羅西的姐姐瑪莉（Mari）以簡單、非暴力的方式完成竊取的計畫，羅西則在同一時間穿上低胸毛衣，挑逗性的轉移超市經理的注意力，以爭取姐姐行竊的時間。她們所犯的偷竊罪，真可算是男性主導搶劫的戲謔版，因為，不需要驚人的體力，無凶殘行為，無需戴上黑色面具便能完成此項復仇計畫。

西摩在《黑色的影子彷彿暴風雨之烏雲》所塑造的女主角莎拉是一位五十五歲的中年家庭主婦，她長年飽受性別歧視，尤其在佛朗哥統治時期，必須遵循男尊女卑的社會倫理法則—女性只不過是男性的附屬品，無法有自主權決定自己的身體及性別主體。作者很成功的捕捉到莎拉的自我解放與女性意識之覺醒：丈夫的突遭謀殺，卻使她頓時從枯燥、無趣、缺乏性愛的婚姻桎梏得到解脫，而有機會重新界定個人的身分主體認同。在作品裡，我們讀到莎拉對過去的省思與未來的憧憬：「她感到很悲哀，過去數十年彷彿被禁錮在愚蠢的貝殼裡，時時得忍受瑣碎、乏味的生活，加上奧斯卡的掌控，那股想像的恐懼更使自己緊縮而無法活動。現在，... 她看到生命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切變的較危險，但卻較令人振奮；較為複雜，卻較自由；較具冒險性，卻充滿可能性與希望」（50-51）<sup>5</sup>。莎拉的首要改變便是前往高級美容院打理外表，重拾對自己身體魅力的信心，這也是追求自我實踐的一大步。由於警探無法繼續辦案，莎拉聯手奧斯卡生前的合作夥伴薇拉（Vera）來調查丈夫的離奇死因，而搖身變成了女性偵探。在其漫長的辦案過程裡，女主角除了揭發丈夫生前不可告人的非法武器交易外，也經歷了女性自我追尋與主體認同的生命旅程。莎拉雖然偵查到幕後的主使者，但終究無法扭轉在街頭被歹徒謀殺的命運；作者似乎有意諷刺女性天生承受了被父權壓抑與迫害的殘酷事實。

眾所皆知，美國硬漢偵探小說裡的男性主角總是被塑造成具有自主能力但喜好獨來獨往的個性，女性偵探小說家卻傾向於建構其女性主體

<sup>5</sup>以上中文譯文為筆者自行由英文版翻譯之，英文版譯文為：“It made her ashamed, all her life closed up in a stupid shell, embittered over trivialities, overcome by Oscar’s domination, and curled up and immobilized by imaginary fears. How... she was learning to see things in another way, and she saw that life was completely different: more dangers, but also more exciting; more complex, but also freer; riskier, but full of possibilities and expectations” (*A Corpse of One’s Own*, 50-51)。

在一個能互相扶持、互相支援的女性網絡。奧莉薇、西摩及瑪荷納在其作品中顛覆了傳統男性硬漢偵探單獨破案的特點，強調女性人物為了捍衛其他弱勢及邊緣女性免於暴力之威脅，而攜手合作、共同尋求破案方法的團結情誼。如此，不僅暗示女性之間的新關係，也重新檢視性別的定義。很明顯的，將女性視為社會群體的概念十分符合訴求女性平等<sup>6</sup>的第二波女性主義之特質，因為第二波女性主義者喜好分享女性的共同經驗，並接受女性獨一無二的特質與女性集體合作的理念。筆者認為女性人物集體獻身參與破案的精神，在某種程度上，也質疑傳統父權認識論體系的權威性；在不同的案例中，三位女性偵探均熱心投入案情，主要是受到那些飽受欺凌、易於受到傷害的女性所激發出來的「姐妹情誼」（sisterhood）所致。羅妮亞在《紫色的研究》（*Estudi en lila*）建立了一個完全由女性朋友、同事所組成的廣大社群，她們不管在工作上或生活上彼此互相依存。我們讀到羅妮亞在尋找強暴古董商艾倫娜·高地（Elena Gaudi）的嫌犯時，不忘通知其他女性友人諸如攝影師娜霧思（Neus）、婦產科醫師梅西（Mercè）、碼頭辦事員蓓芭（Pepa）、護理人員貝兒塔（Berta）等人幫忙破解連環強暴案的疑點。這些都顯現女性網絡的凝聚力是不容忽視的，羅妮亞最後能破案，完全歸功於女性群體的合力協助。羅西則基於自身遭受到超市經理的欺壓所產生的無力感，而引發她勇於協助另一位也屢遭男同事騷擾之女性友人來復仇，這股無助感，最後竟啟發羅西姐妹聯手策劃搶劫超市的復仇計畫，以抗議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所帶來的性剝削。當莎拉了解到自己與奧斯卡生前的秘書薇拉同樣不知不覺的捲入一場欺詐的風暴時，更能領會女性團結的重要性，也促使她盡速探索丈夫的非法交易事業之幕後真相。

在奧莉薇、西摩及瑪荷納的偵探小說裡，我們不難發現三位作家均呈現女主角試圖克服女性狹隘空間所帶來的障礙，而擁有汽車似乎象徵了女性的獨立與行動無阻，特別是像西班牙這個長期以來對於女性施加社會與經濟之束縛的國家，直到佛朗哥統治後期，才有少數女性開始學習駕駛。這種長期約束女性行動自由的政策，在很多情形之下，的確將

<sup>6</sup> 許多評論家皆認為一九七九年於格拉納達（Granada）所召開的女性主義大會開啟了西班牙女性相關團體及組織的分裂。最主要是兩派概念分歧的論戰：一派是所謂的「平等女性主義」（equality feminism），強調推動女性在司法、職場、性／別及社會領域的機會平等；另一派則是「差異女性主義」（difference feminism），其思想乃根據法國及義大利女性主義者所倡導的「差異」概念，於此，此派思潮不強調女性平等與權力的擴張，而尊重女性自我的追尋及女性之間的文化差異，進而建構女性多元身分認同之論述。第二波女性主義則相當於「平等女性主義」，八〇年代興起的後現代女性主義關懷女性種族、國族、文化的差異，則十分符合「差異女性主義」的精髓。關於相關論述，請參閱奈特（Vanessa Knight）的〈平等女性主義／差異女性主義？〉（“¿Feminismo de la igualdad / Feminismo de la diferencia?: A Study and Bibliography of the Debat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ontemporary Spanish Women’s Narrative.”），頁 27-43。

女性侷限在居家及家庭的私有領域。在《黑色的影子彷彿暴風雨之烏雲》，當奧斯卡加薪時，曾問及莎拉的需求，她隨即提出一棟郊區的小屋及一輛汽車之願望，莎拉了解到如果擁有交通工具便不需要依賴丈夫，同時也能建構自己的主體而不需侷限於家居空間。儘管他們如願搬到郊區居住，奧斯卡仍無法理解莎拉為何渴望擁有自己的交通工具，直到奧斯卡死後，莎拉終於實現擁有個人汽車的願望及獲得多年來總被忽視的自我獨立。哈爾德（Hart）認為，作者西摩仔細闡述女主角莎拉如何突破困境以考取駕照，很明顯的顯現當時的社會情境：首先，莎拉必須克服丈夫以父權經濟掌控的家庭模式；其次，除了性別歧視之外，考取駕照意味著接受駕駛課程的昂貴訓練，也牽涉了社會階級的議題探討（1993: 9-10）。羅西在《遠離安道爾》則駕駛自己的車子自巴塞隆納至安道爾謀職，又利用它遠離商業味濃厚的安道爾市區至恬靜的山林，享受假日片刻的烏托邦生活，爾後，在犯案的最後階段，羅西及其姐分別利用車子逃離險境。由於羅妮亞在作品中扮演女性私家偵探，擁有個人的交通工具對她而言是辦案的首要條件，也允許女主角自由的遊走於巴塞隆納的都會環境。

國族、社會階級、性別認同的議題，在奧莉薇、西摩及瑪荷納的偵探小說作品裡也有所探討。儘管卡塔盧尼亞的政壇人物，例如曾擔任卡塔盧尼亞自治區首長多年的普玖依（Jordi Pujoi）極力主張族群文化整合（cultural integration）以建立卡塔盧尼亞國族主義（Catalan nationalism）<sup>7</sup>，然而對於許多卡塔盧尼亞居民而言，身為卡塔盧尼亞人意味著必須以卡塔盧尼亞語為母語，出身於卡塔盧尼亞在地的「純正」家庭，擁有卡塔盧尼亞的名字與姓氏，且積極參與卡塔盧尼亞在地文化；基本上，這樣的身分認同過程，仍依循單一的選擇模式。第奇艾寇模（Susan DiGiacomo）在八十年代初期甚至提出卡塔盧尼亞社會階層分明的論調：「卡塔盧尼亞人屬於中產階級；而非卡塔盧尼亞人則屬於勞工階級」（1997: 73）。宮爾西（Daniele Conversi）卻認為卡塔盧尼亞地區之經濟長期以來雖然由卡塔盧尼亞人掌控，外來移民始終居於社會階層的底端，但近年來隨著社會、文化層面的流動，也有部份外來移民成功的躍升社會階級之案例（1997: 212），因而族裔與社會階級的認同不盡然是對等的。

<sup>7</sup> 學者宮爾西（Daniele Conversi）在其著作對於卡塔盧尼亞身分認同的議題，曾引用普玖依（Jordi Pujoi）之卡塔盧尼亞文化整合的論點加以辯証，原文如下：“Our central problem is immigration and, hence, integration. The basic objective is to build up a community valid for all Catalans. And I would add that by Catalan I mean everybody who lives and works in Catalonia, and who makes Catalonia his/her own home and country, with which he/she incorporates and identifies.”（195）。

西摩在其作品《黑色的影子彷彿暴風雨之烏雲》對於階級、族裔的差異等主題也有所批判。我們讀到莎拉的丈夫奧斯卡在巴塞隆納郊區購買了一棟房屋，兩人原先與中產階級的鄰居們過著和諧的生活，這些鄰居皆是「純正」卡塔盧尼亞人。然而，由於鄰近工業區帶來的環境污染所造成的臭氣，促使這群卡塔盧尼亞鄰居紛紛搬離該社區，緊接著搬來的社群大多是來自於西國其他地區以卡斯提亞語為母語的勞工家庭。女主角莎拉與這群新移民不論在文化或語言方面都沒有共通點，對於莎拉而言，這群新移民社區的女性所表現的行為舉止，似乎不斷鼓吹以卡斯提亞語為母語的勞工階級之文化認同：

大批離去的熱潮開始。他們一個接著一個搬走。莎拉的快樂僅僅持續一年多。歐克斯地區的資產價格大跌，許多房子紛紛以低價售出，此地充滿了許多新移民... [...]之後搬來許多家庭，他們的生活習慣與莎拉不同。女人穿著浴袍、頭上戴著捲髮夾，便出門到街上。她們在窗口互相呼叫，她們口操西班牙語，是由刀子與針組成的西班牙語，有著捲舌音，好比銼鋸齒般銳利。莎拉絕對不是自負的人！但是這群人十分不同。她們是你永遠也不想邀請來家裡造訪的那種人。（《黑色的影子彷彿暴風雨之烏雲》，頁 14-15）<sup>8</sup>

雖然女主角莎拉本身並非屬於知識階層的女性，加上小說一開始，其生活重心皆以丈夫為主，她對於週遭的環境也並沒有太深入的涉略，然而筆者認為西摩藉著莎拉的角色有意反諷第奇艾寇模所提出的卡塔盧尼亞社會階層分明之天真論調，也間接呈現卡塔盧尼亞女性由於性別與國族所造成的「雙重邊緣化」之現象。

儘管奧莉薇在其作品並未深入探討卡塔盧尼亞語系的女性所面臨的「雙重邊緣化」之議題，但在《對蹠地》的第十一章，我們讀到敘述者兼女主角提到自己為了調查經營旅館業的雷歐波多先生（Don Leopoldo）涉嫌販賣年輕女性至海外賣春的案件，必須假冒德國媒體記者接觸在該

<sup>8</sup> 以上中文譯文為筆者自行由英文版翻譯之，英文版譯文為：“So the exodus began. They all moved away one after the other. Sara’s happiness had lasted only a little more than a year. As the ‘The Oaks’ property values went down, the houses were sold cheaply, and the place filled up with families that... [ . . . ] The modest families that moved in later had customs that were strange to Sara. The women went out into the street in their bathrobes and curlers. They called from house to house out the windows, and they spoke Spanish, a Spanish made of knives and needles, with rolling r’s that went out like the teeth of a saw. Sara was no snob, no sir! But these people were different. They were people you wouldn’t invite to your house.” (*A Corpse of One’s Own*, 14-15)。

旅館工作的年輕女性員工，然而卻無法完全聽懂她們以生動、俏皮的卡斯提亞語互相交談。這樣的情形，使羅妮亞不免回想起多年前她的教母與一位來自西班牙本土口操「帝國與天主教徒」(la lengua del Imperio y cristianos)的卡斯提亞語之老婦人也曾多次發生因語言之差異所造成的文化誤解，似乎隱射了國族、「邊緣化」的問題長期以來仍舊未改變(135-136)<sup>9</sup>。

#### 四、暴力與偵探小說文類

暴力是硬漢偵探小說的重要元素，文中常見到的謀殺、搶劫、詐騙或強暴等行為是典型的罪行，而許多情況下受害者是女性。在奧莉薇的偵探小說作品裡，我們發現作者試圖證明男性暴力是父權社會極為普及的現象，大多鎖定女性為侵略的目標。如此，呼應了七十年代女性主義者所提出的理論，那就是男性侵犯女性之暴力行為是無法與現行父權社會體制分開，因為該體制的首要成因就是由男性掌控女性。葛莉芬(Susan Griffin)在其著名的論文〈強暴：全美國人的罪行〉(“Rape: The All-American Crime”)(1971)曾指出，在父權社會下，男性習慣於學習「侵犯」，因為在這樣的社會體制下，人們總是期待男性的侵略性及女性的被動性，好比是性別的刻板印象。由此，對女性施加暴力或侵犯女性儼然成為操縱社會的最佳方式，藉此強迫女性退出公共空間領域。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也持同樣的論點，在其專書《違背我們的意志》(Against Our Will)(1977)中強烈表達強暴是構成父權體制的基石之一，它更是掌控女性參與公共事物最有效的方式。

面對侵犯女性是如此普遍性的事實，奧莉薇運用硬漢偵探小說文類來回應這具有爭議性的議題。在作品《紫色的研究》，女偵探羅妮亞同時偵查兩起案件。首先，她必須找到一位來自馬尤爾卡島的年輕女孩一瑟巴斯狄安納(Sebastiana)，此女遭受強暴而懷孕，因害怕遭到家人的辱罵而離家出走至巴塞隆納。事實上，瑟巴斯狄安納面臨極為棘手的情況，一方面不敢告知父母她已懷孕的事實，擔心毀壞家族榮譽；另一方面，無法決定是否應遵循羅妮亞及婦科醫生梅爾斯(Mercè)的建議進行人工

<sup>9</sup> 關於《對蹠地》裡女主角羅妮亞回顧卡斯提亞語及卡塔盧尼亞語所造成的文化差異，其原文如下：“En més de d’una ocasió me’eren francament inintel·ligibles, i em feien recordar els embolics de la meva padrina amb aquella abuela acabada d’arribar del poble: l’abuela demanava on hi havia una cosa que la padrina era incapaç d’entendre; l’abuela va acabar feta una fúria perquè no li cabia al cap que la padrina fos tan toixarruda que no l’entengués; la padrina es posava feta un nero, idó que xerri clar, aquesta dona. I la dona: *por qué no hablan cristiano, por aquí?*” (Antiòpodes, 135-136)。

墮胎，抑或回到家鄉生下小孩。最後由於父母即將前往巴塞隆納造訪的消息促使瑟巴斯狄安納退縮，竟選擇在羅妮亞寓所的澡缸結束生命。瑟巴斯狄安納的悲劇案件應歸咎於佛朗哥統治時期或更早時期所盛行的「貞操法則」，也因此許多西班牙女性，特別是那些未受良好教育或缺乏安全感的邊緣女性，視強暴為羞辱及罪惡感的來源，而且，根據學者布魯斯班克（Anny Brooksbank）對於當代西班牙女性研究的觀察（1997: 95），向政府當局揭發強暴事件，通常只有使女性受害者遭受到更多的創傷。女主角羅妮亞身為偵探也無法逃脫性暴力的威脅。在某一章節，羅妮亞遭受惡徒郭馬拉（Gòmara）僱用兩位殺手猛烈的撕打，以暴力扯下羅妮亞的襯衫，甚至暴露其胸部之行為，完全基於女主角羅妮亞是女性。

另一起案件則有關尋找強暴巴塞隆納骨董商艾倫娜（Elena Gaudi）的三位男子。嚴格說來，羅妮亞負責調查的兩起案件同質性頗高，兩件案子都因強暴行為涉及了性別、權利及男女性關係等相關議題。艾倫娜（Elena）極為渴望找到數月前集體強暴她的三名共犯男子，其復仇的想法十分明確，也決定實踐激進派女性主義者在巴塞隆納街頭的牆壁所張貼的標語：「用閹割對抗強暴」（“Contra violación, castración”）（191）。本作品原文書名 *Estudi en lila* 是具有特別的涵義。「Estudi」（study）可解釋為學習或認真研究某件事物，若以作品案例而言，則是應用某一理論；「lila」（lilac）則是暗指以淡紫色噴漆塗抹在巴塞隆納街頭上之標語。因此，本書名可算是艾倫娜實行報復強暴者罪行之行動計劃，當然還加上羅妮亞的協助。直到小說即將接近尾聲，羅妮亞才意識到艾倫娜殘忍的復仇行為，剛開始非常驚恐，然而女主角其於女性的共同經驗而經過一番深刻的思索之後，決定不介入艾倫娜的自行執法（閹割共犯者），最後讓艾倫娜順利逃離巴塞隆納，不需接受法律的制裁。筆者認為羅妮亞掩飾骨董商的理由，一是緣自於女性的團結情誼，二則顯現女主角深切明瞭強暴對於一位女性是具有多麼強大的負面影響。

奧莉薇在下一部小說《對蹠地》繼續探討暴力侵犯女性的主題。女主角羅妮亞為了舒緩及忘卻前兩起案件所帶來的精神、道德壓力，決定遠行至南半球的澳大利亞度長假。羅妮亞不改其追求正義及性別平等的偵探精神，致力於調查克莉斯汀娜（Cristina）之案件，她是來自於馬尤爾卡島的一位富家女子，雖出身豪門，卻因家族內部鬥爭，不幸捲入了國際賣春組織，甚至被迫吸毒、接待男性客戶。羅妮亞在其橫跨墨爾本、巴塞隆納及馬尤爾卡島的辦案過程裏，見證了家鄉馬尤爾卡島的財團企業家及旅遊業者由於貪圖經濟利益，不惜過度開發甚至破壞島嶼之生態

平衡，而觀光產業的蓬勃也衍生出全球性的販毒及娼妓等社會問題。毫無疑問地，眾多女性是這些開發案中被剝削的受害者，不管是對身體亦或精神的侵犯皆是暴力的威脅。女主角羅妮亞不斷思索家鄉馬尤爾卡島及墨爾本的年輕女子之卑微的身分，她深信女性被剝削乃源於傳統上女性始終必須「出租」自己的某些東西，舉凡她們的手，她們的脊背，她們的頭部，甚至她們的性器官以換得某些利益（《對蹠地》頁137）<sup>10</sup>。以羅妮亞本身為例，雖身為私家偵探，也懂得自衛之道，但仍然時常慘遭男性歹徒的撞擊、毆打；在本作品，羅妮亞由於調查雷歐玻多先生的國際販毒與賣春案件，甚至遭受幫派暴力威脅造成肋骨斷裂、左耳失聰的肉體殘害。

西摩在其小說《黑色的影子彷彿暴風雨之烏雲》，藉著女主角莎拉的偵查案件，除了剖析女性自我實踐與主體認同的主題，作者似乎有意傳達女性由於性別之關係，飽嚙父權暴力之壓迫而終就淪為暴力之犧牲者。莎拉在其二十五年的平淡婚姻生活中，始終扮演「次要角色」的家庭主婦，從未有機會接觸社會的黑暗層面，因此，面對丈夫奧斯卡所遺留的龐大遺產，她自發性地參與調查丈夫生前投入之軍火交易，部分原因則是想以行動改變自己過去被動、倚賴的性情。透過多位友人的協助及蒐集線索，莎拉終於得知軍火交易的幕後指使者為奎拉特先生（Sr. Queralt）。不顧自身安危的莎拉堅持與奎拉特先生會面，展現了女性偵探追求正義與真理的特質，而雙方經過激辯與妥協之後，莎拉將獲得公司的部分股份以作為賠償。事實上，女主角已攜帶錄音機私自錄下了奎拉特先生承認參與軍火交易的談話，準備交與司法單位處理，因為杜絕非法軍火買賣對於莎拉而言，是每位國民基於道德良知而刻不容緩的任務。西摩以簡潔又緊湊的筆調描繪莎拉的自信與欣喜，然而當女主角離開公司大門，隨即遭到男性歹徒搶劫裝有小型錄音機的錢袋，等到好友薇拉趕來，莎拉已被謀殺，僵硬的平躺在街道上。小說以暴力的場景結束，尤其是莎拉的額頭慘遭子彈射擊所遺留的凝重血塊之影像，帶給讀者無限的遺憾與省思：「那是一個帶著黑色影子的額頭，就像暴風雲般的烏黑，一位終究仍一無所有的女性之額頭，她甚至也無法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空間，只有街上容納自己屍體的些微空間」（《黑色的影子彷彿暴

<sup>10</sup> 關於女主角羅妮亞對於女性如何被剝削，請參照該書卡塔盧尼亞語原文：“En definitiva, per què el cony ha de ser més sagrat que qualsevol altra part del cos? Si una dona volia llogar el seu cos a un home per boixar, no hi tenia el mateix dret que si el volia llogar per escriure-li les cartes i els informes a màquina? . . . El mar era que sempre fossin les dones que haguessin de llogar quelque cosa, la cotorra, les mans, l’esquena o el cap.” (*Antiòpodes* 137)。



風雨之烏雲》，頁 166-167）<sup>11</sup>。我們可以說莎拉為了捍衛正義與公理，不惜犧牲自我，抵禦父權暴力的威脅，遠遠的超越業餘偵探的角色。

在瑪荷納的小說《遠離安道爾》，暴力的議題主要環繞在男性對於女性的性騷擾、性別歧視與女主角的報復行動。羅西被塑造為聰明、討人喜歡與追求性別平等的女性復仇者與盜賊，這可算是作者的一項文本策略，試圖創造讀者與作品角色之間的共融與認同，因而增進讀者對於女主角所執行的搶案有某種程度上的共謀（*complicity*）關係。瑪荷納對於女主角的違法行為提供更諷刺的評論。一切的復仇計畫由羅西策劃，其姐妹瑪莉為了順利將竊取的金錢帶到邊界，竟將每一張鈔票塞入一盒女性衛生棉中。這樣的舉動，作者以幽默又戲謔的方式呈現父權體制所掌控的金融世界必須屈就於女性的生理，因而顛覆了一般男女勞資關係，亦即女性通常需要販賣勞力甚至出賣身體以賺取微薄的收入來維生。羅西的復仇與逃離安道爾，代表女性對全球化、父權團體的經濟體系提出強烈抗議，因為以男性為中心的資本主義所衍生的性剝削與性暴力是極為值得批判的。

## 五、結論

巴巴（Homi Bhabha）在九十年代初期對於敘述文體的書寫趨勢曾語重心長的表示：「國家的邊緣區域逐漸取代了中心地域，因此，周邊的人試圖改寫大都會的歷史與小說」（1990: 7）。儘管巴巴所言是泛指以英語書寫的文學作品，但他的論點也可應用在奧莉薇、西摩及瑪荷納等三位來自卡塔盧尼亞語區的女性作家之作品。由這些作品中，我們得知女性原先是「周邊」社會的居民，如今已移到中心地域書寫她們自己的歷史，並能以母語書寫卡塔盧尼亞語區的女性如何追求自我實踐與主體認同的艱辛歷程。以奧莉薇、西摩及瑪荷納三位女性作家為例，她們選擇以偵探小說文類創作具有特別的意涵，因為此文類長久以來始終被文評家視為「邊緣」的文化產物，與卡塔盧尼亞語區的女性所面臨的雙重邊緣化之社會困境頗為雷同。然而，近年來隨著後現代與全球化所強調的混雜（*hybridity*）與流動（*fluidity*）之文化特質，偵探小說文類也隨之擠入主流文類之一。研讀奧莉薇、西摩及瑪荷納的作品，使我們了解到卡塔

<sup>11</sup>以上中文譯文為筆者由英文版翻譯之，英文版譯文為：“It was a forehead with a black shadow on it, black like a storm cloud, a forehead of a woman who had ended up with nothing at all on her own, not even a room, just the space on the street taken up by her own dead body” (*A Corpse of One's Own*, 166-167)。

盧尼亞不再是西班牙的「邊緣」地域，而三位女作家以卡塔盧尼亞方言／母語為她們自己發聲，作品裡的女性偵探皆扮演著多重身分的角色，其漫長的主體認同之歷程也充分的解構傳統父權社會所賦予女性之刻板形象。毫無疑問的，三位女作家均試圖以反諷的態度來探索父權暴力如何施與卡塔盧尼亞女性身體及女性主權之威脅。

## 引用書目

- Brooksbank Jones, Anny. *Women in Contemporary Spai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1997. Print.
- Bhabha, Homi K. "Introduction." *The Nation and Narration*. Ed. Homi K. Bhabha. London: Routledge, 1990. 1-7. Print.
- Brownmiller, Susan. *Against Our Will: Men, Women and Rap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5. Print.
- Converseri, Daniele. *The Basques, the Catalans and Spain. Alternative Routes to 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London: Hurst and Co., 1997. Print.
- Cranny-Francis, Anne. *Feminist Fiction. Feminist Uses of Generic Fiction*. Cambridge: Polity, 1990. Print.
- Davies, Catherine. *Spanish Women's Writing 1849-1996*. London: The Athlone P, 1998. Print.
- DiGiacomo, Susan. "Images of Class and Ethnicity in Catalan Politics 1977-1980." *Conflict in Catalonia: Images of an Urban Society*. Ed. Gary W. McDonogh. Gainesville: UP of Florida, 1986. 79-92. Print.
- Godsland, Shelley and Anne M. White. "Investigating Fictions of Identity: Contemporary Catalan Fictions by Women." *Crime Scenes: Detective Narratives in European Culture since 1945*. Eds. Anne Mullen and Emer O'Beine. Amsterdam: Rodopi, 2000. 219-27. Print.
- Godsland, Shelley. "Maria- Antònia Oliver: la reescritura femenina/feminista de la novela negra." *Bulletin of Hispanic Studies* 79. 3 (2002): 337-52. Print.
- . "Mujeres que matan: Violencia femenina y transgresión social en la novela criminal femenina española." *Monstruosidad y transgresión en la cultura hispánica*. Ed. R. De La Fuente Ballesteros y J. Pérez Magallón. Valladolid: Universitas Castellae, 2003. 151-67. Print.
- . *Killing Carmens. Women's Crime Fiction from Spain*. Cardiff: U of Wales P, 2007. Print.
- Griffin, Susan. "Rape: The All-American Crime." *Ramparts* 10.3 (1971): 26-35. Print.
- Hart, Patricia. *The Spanish Sleuth: The Detectives in Spanish Fiction*. Cranbury, NJ y London: Associated U P, 1987. Print.
- Humm, Maggie. "Feminist Detective Fiction." *Twentieth Century Suspense. The Thriller Comes of Age*. Ed. Clive Bloom. New York: St. Martin's P, 1990. 237-54. Print.

- Klein, Kathleen Gregory. *The Women Detective. Gender and Genre*. Urbana: U of Illinois P, 1995. Print.
- Knight, Vanessa. “¿Feminismo de la igualdad / Feminismo de la diferencia?: A Study and Bibliography of the Debat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ontemporary Spanish Women’s Narrative.” *Hispanic Research Journal* 2.1 (2001): 27-43. Print.
- Margenat, Assumpt. *Escap’t d’Andorra*. Barcelona: La Magrana, 1989. Print.
- . *Wild Card*. Trans. Sheila McIntosh. Seattle: Women in Translation, 1992.
- Oliver, Maria Antònia. *Estudi en lila*. Barcelona: La Magrana, 1985. Print.
- . *Estudio en lila*. Trans. Manuel de Quinto. Barcelona: Vidorama, 1989.
- . *Antípodes*. Barcelona: La Magrana, 1987. Print.
- . *Antípodas*. Trans. Manuel de Quinto. Barcelona: Vidorama, 1990. Print.
- Munt, Sally R. *Murder by the Book? Feminism and the Crime Novel*. London: Routledge, 1994. Print.
- Resina, Joan Ramón. “Detective Formula and Parodic Reflexivity: *Crim*.” *The Garden Across the Border. Mercè Rodoreda’s Fiction*. Eds. Kathleen McNerney and Nancy Vosburg. Selingsgrove: Susquehanna UP, 1994. 119-34. Print.
- . *El cadáver en la cocina. La novela criminal en la cultura del desencanto*. Barcelona: Anthropos, 1997. Print.
- Simó, Isable-Clara. *Una ombra fosca, como un núvol de tempsta*. Barcelona: Area, 1991. Print.
- . *A Corpse of One’s Own*. Trans. Patricia Hart. New York: Peter Lang, 1993. Print.
- Vázquez Montalbán, Manuel. *Historias de polític-ficción*. Barcelona: Planeta, 1987. Print.
- Woolard, Kathryn. *Double Talk: Bilingu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in Catalonia*. Stanford: Stanford UP, 1989. Print.